

第二辑

北京党史 专题文选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北京党史专题文选

第二辑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新华出版社出版

京新登字110号

北京党史专题文选

第二辑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88500字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011-2225-3/K·209 定价7.00元

编 辑 说 明

本书系我室编辑的《北京党史专题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一书的续集，精选、收录了近年来关于中共北京地方党史的专题研究文章28篇。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3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5篇。

本书的编排以文章内容的历史先后为序，除注明原版出处外，均收自本室主办刊物《北京党史研究》（《北京党史通讯》）。

本书由吴慧敏负责选编，谢荫明、吴家林审定。在编书过程中，我们对原文进行了加工，少数文章略有增删。关于书中的疏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

1993年3月

目 录

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考述·····	萧超然 金安平 (1)
加拉罕使华和北京群众争取签订中苏协定的 斗争·····	谢荫明 (14)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员在北平狱中斗争 纪实·····	李万启 (22)
“二战”时期中共北京(平)党组织遭受破坏的 情况·····	黄景山 张京民 (57)
十年内战期间北平革命文化运动述略·····	张注洪 (75)
从“九一八”到“七七”北平人民的抗日救国 运动·····	成汉昌 王美秀 (86)
“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平报刊述评·····	王美秀 (103)
平津城市工作秘密交通线·····	张京民 (115)
北平外围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政区 沿革·····	李铁虎 (128)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京郊党组织沿革 概况·····	赵秀德 (139)
中共冀中区委北平工作委员会的建立及其 活动·····	赵凡 吉元 (149)
为解放一个完整无损的文化古都而奋斗·····	方 亭 (156)
北京妇女社团发展概述(1906—1948) ·····	刘宁元 马晨彤 (171)
北平和平解放中的联合办事处·····	梅 佳 (180)
北平解放初期接管报社和广播电台纪实·····	张寿颐 (188)
接管国民党北平警察局·····	于行前 (201)

北平解放初期整顿金融平抑物价保障供给的

概况	刘志学 (209)
北平解放初期的社会治安工作	李润山 (219)
北京日报诞生前后	王 迪 (230)
北平党组织公开	席雄厚 (236)
北京市封闭妓院纪实	李润山 毛殿良 (244)
北京郊区的土地改革	祝遵璜 (256)
北京市“三反”运动的经过	谢大勇 (279)
解放初北京市收容教育野妓暗娼纪实	李润山 (285)
北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回顾	祝遵璜 (295)
北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简述	朱莺娜 (316)
北京市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概述	张京民 (339)
北京改革十四年	段柄仁 (354)

青年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考述

萧超然 金安平

当历史几经挣扎，终于走出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阶段——新文化运动勃然兴起时，青年毛泽东从中国南方的湖南省走进了这一运动的中心——北京。古都北京以她恢宏的气度、凝重的文化和不可替代的政治地位成为20世纪一个新的革命潮流的发源地。青年毛泽东的两次北京之行也成了他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过程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一、两次往返北京的原因、时间和路线

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的直接原因是为组织、筹备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由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的华法教育会于1917年4月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备案，作为组织和经办留法勤工俭学机关，同时在北京、上海、保定、蠡县等地设立了留法预备学校或预备班，向全国招生。消息传到湖南后，毛泽东与蔡和森、罗学瓚等人商量，组织全体新民学会会员参加勤工俭学。不久，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先生也给他们传来了信息：他已与蔡元培先生联系过，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可望成功。1918年6月，蔡和森到了北京，并很快给毛泽东和其他新民学会会员写信，要他们来京。蔡和森在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先生的意见，希望毛泽东来京后“入北京大学”。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昆弟、罗学瓚、李维汉、罗章龙等25人一起从长沙乘船启程；到达武汉后，经由汉口大智门车站换乘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8月19日到达北京前门车站。毛泽

东等几个人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的家里。不久，毛泽东、罗章龙、萧子升等人在北京大学附近的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现名吉安所左巷）7号租了两间房子，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

毛泽东这次在北京停留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便绕道上海回湖南了。关于返湘的原因、时间和路线，过去大多是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录下的毛泽东1936年的一段回忆为依据，推论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北京后，置身于古迹名胜之间，觅古寻踪，历时数周。但是，新近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材料：1919年4月28日毛泽东《致七、八舅父母信》中说，“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历〕三月十二号动身，十四号到上海，因事勾留二十天，四月六号始由沪到省。”如果说毛泽东所从事的活动有不便对家人说明之处，那么，行动的时间该不会隐瞒和杜撰的。应该说由原始材料记载下来的时间比回忆的时间要准确。当时的铁路交通情况是：从北京到上海，一般是先沿京奉铁路到天津，然后由津浦路到浦口，由浦口渡船过江到南京下关，再沿沪宁路到上海。姑且不论转乘这几次车船，是否在时间上衔接得很紧，就是在现在的铁路交通条件下，一两天之内，从北京出发，在拜谒孔庙、登临泰山、游历名城之后能赶到上海也是很难做到的。由此看来，毛泽东第一次离开北京绕道上海回湘途中没有游览的时间。可是，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却清楚地回忆起他年轻时的游历，甚至连一些细节都没有忘掉。看来，毛泽东确有过这番经历，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忘记了准确的时间。实际上，这次游历应该是在1920年毛泽东第二次离京途中。至于毛泽东为什么在1919年3月离开北京？这封信提供的材料说是因得到其母病重的消息才离开北京的，这可能是毛泽东急于离京的原因之一。但是，绝不会只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到上海后还“勾留了二十

天”，并未立即赶回湖南服侍母亲。那么毛泽东很快离开北京的原因还有哪些呢？当然，首先是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之事有了眉目，也就是说此次北京之行的直接目的已达到，毛泽东要到上海去为第一批赴法人员送行；第二，毛泽东认为他应该回湖南开辟一个新的阵地，他曾对罗章龙说，“我们同志不应该堆积在一起，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地都要开辟，各方面都应该决定打先锋的人。”但他决定南下，还是令人感到有些突然和遗憾，他的朋友们也曾挽留过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到京后并未如老师所希望和他自己所向往的那样投考北京大学。在成为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后，虽然他参加了一些社团活动，拜见了一些名流学者，但总的感觉是“失望”的，与他原来所想象的有差距。他对斯诺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①甚至有材料说，毛泽东一次问胡适一个问题时，胡适因他是一个没有注册的职员而拒绝回答^②。毛泽东在当时给萧子升的信中也流露出这种失望的情绪，认为，就他在北京的处境而言，他的工作开展会受到限制，想回湖南，在那里仍以“新民学会”为中坚力量，建立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这可以说是毛泽东不会长期留在北京的一个主要原因。送别勤工俭学的学员和探候母病则是两个直接原因。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是为驱张之事。1918年3月，军阀张敬尧进驻湖南任督军兼省长以来，在湖南实行残暴统治，使湖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1919年12月初，因日本军队在福州造成震动全国的福州惨案，长沙学生举行集会，在教育坪焚烧日货，遭到张敬尧的野蛮镇压。毛泽东、何叔衡等及时领导湖南各界人民开展

了驱张运动。为了争取全国舆论支持，毛泽东等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分赴上海、武汉、衡阳、北京等地。毛泽东率领的一个40人的代表团于1919年12月18日到达北京。1920年4月1日，“湖南改造促成会”在上海成立后，毛泽东决定赴上海。同时，另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员也将要从上海启程。4月11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呢？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于上海写给北京的黎锦熙的信中说，“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趟，二十五天才到上海。”^③从这封信看，毛泽东4月11日离开北京，费时25天（即5月5日）才到上海。这与前面提到的“觅古寻踪，费时数周”是相吻合的。信中所提游览之地，与他在《西行漫记》中所述1919年初的经历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年轻时拜谒孔庙、泰山之举，是在他第二次离京转道上海返湘途中。6月11日，张敬尧退出湖南。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

还有的材料认为，毛泽东第二次离京是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一起护送杨昌济灵柩回湖南途中，在汉口转道上海的。如《文史资料选辑》（北京政协编）第11辑所载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一文。但此文是转述杨开智同作者的一次谈话，除此之外，还没有发现其他文字材料记录毛泽东护送杨昌济灵柩回湘的情况。从时间上看，杨开智的回忆说是在5月，而据《中国现代教育家传》第4卷所附《杨昌济重要年表》记载，杨昌济的灵柩是2月从京送回故里长沙东乡板仓安葬的，3月22日，在长沙的生前好友和学生在兴汉门衡粹女校为其举行了追悼会。资料表明，2月至3月，毛泽东在北京仍有频繁活动，不会在这个时候护灵南下；从行进路线看，毛泽东第二次离京到上海走的是津浦线、沪宁线，而不是由汉口转道上海，因此，也不会是顺路送灵；从礼节和感情上看，毛泽东也不会在送灵途中下车游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多次到医院看望杨先生。杨先生病逝后，他曾到法源寺与杨开智、杨

开慧兄妹一起守灵，并发起募捐，抑恤遗属，操办丧事。这其中肯定包括筹划如何将杨的灵柩送回故里安葬之事，甚至不排除有短时间、短途的送行（如护灵上车，至丰台或天津等等）。但护灵回故里或到汉口转道，恐怕有误。

二、两次北京之行所从事的活动

一般认为，毛泽东在北京期间，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拜访了名流学者，结交了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使其思想、信仰发生了重大变化。这里要研究的是两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到京后，先是解决生活问题。在有了住处之后，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的主要活动是通过杨昌济的关系，与蔡元培、李石曾等华法教育会的负责人联系进赴法预备班，筹集路费等。应“华法教育会”的要求，毛泽东为湖南学生起草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并帮助罗学瓚入北京留法预备班、蔡和森入蠡县布里村预备班、张昆弟入保定育德中学预备班。1918年9月，同毛泽东一道从长沙来的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预科，而毛泽东“中途易辙”，既没有按杨昌济的希望投考北京大学，也没有进赴法预备班，并表示不去法国了，这可能是出于经济原因。但毛泽东仍愿为其他会员赴法而奔走。为了能留在北京开展这一活动，毛泽东决定找一份工作。毛泽东和蔡和森通过杨昌济的关系请求蔡元培校长帮助。蔡元培建议毛泽东就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并写了张条子给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说，“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④1918年10月，在李大钊的安排下，毛泽东当上了图书馆的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图书馆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即日报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名字，收理15种中外文报纸，月薪是大洋8元。毛泽东一向有爱读报的习惯，这

个工作对他无疑是相当称心的。毛泽东还在这里读到了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欢呼十月革命的著名文章。

毛泽东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该会是我国第一个有组织的新闻学研究团体，开中国将新闻作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之端。研究会由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教授徐宝璜以及著名新闻记者、《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毛泽东过去常为报刊撰写各种稿件，喜欢研究有关新闻业务的理论与实践诸问题，还一度有过以教师或记者作为终生职业的打算。当他看到《北京大学日刊》上招收会员的《校长布告》后立即报名参加了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每周讲习三至五次，除徐宝璜讲授新闻学和新闻史外，邵飘萍在学会做过多次讲演，并负责同学的实习辅导，许多学员都感到“着实获益，短期讲用，一生受用不少”。毛泽东在这里还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等人。毛泽东热忱地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毛泽东参加的另一个学术团体是1919年1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杨昌济、马叙伦、陶履恭、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成立的，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淪启新知”^⑤。素来受杨昌济先生的影响喜爱哲学、关心道德问题的毛泽东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参加了研究会。

毛泽东在北京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其心境也是很复杂的：一方面抱着很大的求学欲望，但现实未必尽如人意；另一方面，虽已勉力跻身于最高学府，但毕竟地位卑微，心理难以平衡。同时，他仍时时放心不下湖南的事。其时，能够对他这种复杂甚至有些惆怅的心境以补偿的是北京的自然风光。他回忆说，“古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在故宫的庭院里，我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了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

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⑥甚至毛泽东还有兴致去看一看大海。萧三回忆：1918年冬，“我和毛主席都想到，没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因此决定到天津附近大沽口去看看。我们乘火车到天津，然后又转车去了大沽口”^⑦。当然，他们只看见了一片冰雪，不过毛泽东仍很满足。

1918年11月上旬和1919年3月初，毛泽东还两次到长辛店铁路工厂了解设在那里的赴法预备班的情况。据李维汉、何长工等人的回忆，毛泽东对了解长辛店铁路工人的生活 and 劳动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第一次在京期间，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也正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颠峰时期。毛泽东亲眼见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活动，也有幸结交了一些名人学者。从毛泽东的活动看，他首先与蔡元培有过接触。对于蔡元培，毛泽东仰慕已久，到北京后，蔡元培为他介绍工作，他是感激的，他给蔡元培写信自称学生。为勤工俭学之事，毛泽东与其他人一起拜晤过蔡元培，新民学会会员还请蔡元培来座谈，蔡元培认真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蔡元培的人品与学问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梁漱溟当时在北大担任印度哲学课讲席，是哲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与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既是同事又是好友。所以，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学术思想及为人是有所了解的。对于陈独秀，毛泽东是崇拜而尊重的，毛泽东本人回忆说在第一次到京期间，陈独秀给了他很大影响，但现在还缺乏他们之间接触的具体材料。同毛泽东在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那里受到的冷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邵飘萍的热情。毛泽东听过他的演讲，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在离开北大后的1920年6月，毛泽东在给罗章龙写信时还特别问到邵飘萍的情况，罗章龙认为邵是毛泽东所关心的人。毛泽东自己也这样讲过，“邵飘萍对他帮助很大”，“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

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⑧。

毛泽东1919年3月12日离开北京时，其心情是复杂的。当一个色彩缤纷、耀眼夺目的新世界展现在他面前时，他也许还不能够立即与它融为一体，这个新世界似乎也没有完全接纳他；但是，毕竟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迈出了从湖南走向中国的第一步。

第二次北京之行，毛泽东的活动主要是三个内容。

第一是开展驱张斗争。这次在北京，他独当一面，开办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撰写文章、通电；率领代表团上书、上访，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毛泽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是1919年12月18日到北京的。毛泽东住在北长街99号福佑寺后院，随后成立的平民通讯社就设在这里。毛泽东每天向全国报刊编发揭露张敬尧的稿件，“每日发出稿件五十余份”^⑨。毛泽东一到北京，首先到北京大学西斋找到了湘籍学生罗章龙，希望湖南旅京学生响应驱张运动。12月20日，湖南旅京学生就派出代表于中午1时“往谒国务总理”^⑩。21日，湖南旅京学生及各界人士200余人召开了慰劳湖南代表大会。12月28日，毛泽东组织出席了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并讲了话，同与会者商讨驱张办法。1920年1月3日下午，北京学生联合会又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了慰问驱张代表团大会。1月8日，毛泽东和邓中夏、罗章龙等湖南辅仁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聚会，讨论驱张等问题。1月18日，毛泽东起草并发出了驱张的快邮代电，继续向全国揭露张的罪行。28日，毛泽东等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分别从前门、后门和西华门向国务院进发，沿路宣讲驱张道理，在新华门前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示威。毛泽东和张百龄、李思安、柳敏等人被推举为代表进入国务院，同北京政府的接待官员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这位官员不得不答应撤免张敬尧的要求。

毛泽东活动的第二个内容是思考和筹划今后湖南建设问题。在驱张活动基本告一段落后，毛泽东集中精力考虑驱张后的湖南

建设问题。他修改了“湖南改造促成会”的章程，并就湖南今后建设问题向黎锦熙征求意见。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寄给黎锦熙。对于今后湖南改造的计划和设想，毛泽东这时仍没有放弃“自治”的主张，同时对“新村主义”也保持着相当的热情。他将他的这种“新村主义”改造湖南、建设湖南的设想以《学生之工作》为题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并于1920年4月7日，到八道湾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倡导人。毛泽东与周作人的谈话内容，不见记载，但可以推想是以“新村运动”为主要话题的。

毛泽东活动的第三个内容是广泛联系各界人士，吸取新知，在各种主义与学说的比较中，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在开展驱张活动中，毛泽东为争取更多的支持，与社会各界人士联系、接触。据记载，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访问了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⑩。毛泽东后来到上海后曾给胡适写信。张敬尧被赶出湖南后，毛泽东又从长沙给胡适写信，告诉他驱张后湖南“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希望他以后对湖南继续关照，“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⑪等等。毛泽东在1920年从北京给周世钊写信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⑫毛泽东还同北京政府官员打了交道。1920年2月，毛泽东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并与其保持了长期的联系。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三年会费2元”的记载；学会解散前夕，毛泽东还认真填写过“会员调查表”。毛泽东还就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之事，同李大钊进行过多次讨论。毛泽东在开展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挤时间读了不少书，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真理。毛泽东在第二次留京期间

读了哪些书呢？现在可以确定的有：介绍俄国革命的小册子；毛泽东自己谈到的《共产党宣言》等名著。此外，毛泽东还可能读了一些其它社会科学的译著，他曾打算“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功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④。毛泽东第二次在京期间，思想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这时他并没有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在4个多月中，前两个内容的活动占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他还没有来得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研究。1920年3月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毛泽东也未与之发生联系。他对各种学说，仍处于比较之中，他对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仍感兴趣。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⑤说明他的思想还处于量变阶段。但是，这种量的积累已接近质变的临界点了。不久，在1920年夏，他就实现了这种转变。

三、两次北京之行在青年毛泽东成长过程中的作用

两次北京之行，到底在毛泽东早年思想转变过程中起了一种什么作用？北京的人和事对青年毛泽东有什么影响？综上所述，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北京的文化氛围对毛泽东的熏陶。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阵地的北京，本来就是全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再加上它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氛围。毛泽东在来北京之前，没有出过湖南省界。在湖南求学的几年中，他读书、看报，脑子不停地思考问题。正是在1918年中国发生一场新的革命的前夕，在时代又将发生一次嬗变的时候，毛泽东来到了北京。北京人才荟萃，思想界、学术界处于异常活跃时期，各种新思想在这里争奇斗艳。这对于渴望学识、追求真理的年轻人来

说，该是一种怎样的兴奋与刺激！北京之行打开了毛泽东的眼界，使毛泽东开始了站在历史潮头的生涯。北京文化氛围的那种潜移默化熏陶与影响，使毛泽东在成为革命者的同时，也成为潜在的文化巨匠和思想巨匠。

第二，北京之行对他选择信仰的影响。北京毕竟是文化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毕竟是拥有最大藏书量的大学图书馆。毛泽东在北京读到了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毛泽东之信仰确定，是从各种主义、学说比较中逐渐形成的。要比较各种主义、学说，首先要了解这些学说。我们知道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的文章、介绍俄国革命之书刊，还有毛本人谈到过的几本书，都是毛泽东在北京读的，而且是在出版或发表之后极短时间内先睹为快的。这些书在毛泽东确定信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他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方向是很关键的。

第三，北京各种人物对毛泽东的综合影响。毛泽东在北京接触的对他产生过影响的人大约可分为这样几种：第一种，是当时北京的名流学者。如蔡元培、陶孟和、胡适、梁漱溟、邵飘萍等。对这些人从神交已久到亲自接触，是毛泽东早年经历中的一笔财富。但是，从所发现的材料看，毛泽东并未与他们有过深、过多的交往，对这些人的更多了解还是从他们的学问、思想获得的。尽管这样，毛泽东对他们的印象都非常深刻，在后来的回忆中都一再提及并引以为自豪。这些名流学者们精深的学问和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使青年毛泽东感到了一种吸引力和精神满足，并在毛泽东日后的修养和领袖品格形成过程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第二种，是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的影响在毛泽东世界观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自己也深情地回忆说，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